

近代汉语音韵研究

蒋冀骋 著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近代汉语音韵研究

蒋冀骋 著

责任编辑 徐新平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山)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开 9.5印张 222千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册

ISBN7—81031—586—2/H·036

定价：20.00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二章	晚唐五代音韵	9
一	声母系统	9
	(一) 通语的声母系统	9
	(二) 西北方音的声母系统	18
二	韵母系统	34
	(一) 通语读书音的韵母系统	35
	(二) 口语的韵母系统	44
	(三) 西北方音的韵母系统	59
三	声调系统	75
	(一) 浊上开始变去	75
	(二) 入声韵尾在口语中已开始弱化	80
第三章	宋代音韵	81
一	声母系统	81
	(一) 北宋时期的声母系统	81
	(二) 南宋时期的声母系统	105
	(三) 宋代西北方音的声母系统	111
二	韵母系统	117
	(一) 北宋时期的韵母系统	117

(二)	南宋时期的韵母系统·····	133
(三)	宋词用韵反映的韵母系统·····	142
(四)	宋代等韵图反映的韵母分合现象·····	147
(五)	宋代西北方音的韵母系统·····	156
三	声调系统·····	162
第四章	金元音韵·····	169
一	金代声母系统·····	169
二	金代韵母系统·····	174
三	元代声母系统·····	183
(一)	《中原音韵》反映的 中原口语声母系统·····	183
(二)	《蒙古字韵》反映的 北方读书音声母系统·····	193
(三)	《中原音韵》与《蒙古字韵》音系 在声母方面的区别·····	201
(四)	元代吴方言的声母系统·····	203
四	元代韵母系统·····	210
(一)	《中原音韵》反映的 中原口语的韵母系统·····	210
(二)	《蒙古字韵》反映的 北方读书音韵母系统·····	229
(三)	《中原音韵》与《蒙古字韵》 韵母系统的比较·····	245
五	声调系统·····	246
(一)	《中原音韵》的声调·····	246
(二)	《蒙古字韵》的声调·····	249

第五章 明清音韵·····	250
一 声母系统·····	250
(一)韵书中反映的明清官话声母系统·····	250
(二)对音材料反映的明代官话声母系统·····	263
(三)韵书中记录的明清南方方言的声母系统·····	268
二 韵母系统·····	273
(一) 韵书中反映的明清官话韵母系统·····	273
(二) 对音材料反映的明代官话韵母系统·····	282
(三) 韵书中记录的明清 南方方言的韵母系统·····	285
三 声调系统·····	293
参考文献·····	295
后 记·····	299

第一章 绪 论

近代汉语音韵的研究对象是晚唐五代以降至明末清初间的汉语语音。^① 它的状况、它的演变和发展以及演变发展的方式和原因——有些可以说出原因,有些暂时还说不出原因,是我们所关注的重点。研究的目的是有两个:一是为汉语语音史研究提供阶段性成果,一是为现代汉语语音(主要是以北京方音为基础的普通话语音)的形成做些阐释,如儿化音的产生、入声的消失、浊音的清化、-m 韵尾的消失、四声的演变、尖团的合流等。为汉语语音史研究提供阶段性成果主要靠描写,通过对文献材料的研究分析,描写出各时代(指晚唐以来)的语音状况,但也离不开音理分析。某时期某种语音现象消失了,某时期某种语音现象产生了,消失的原因是什么?产生的基础是什么?需要从音理上去分析。但语音演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是任何一种语音演变现象都能在现代的学术水平情况下说出原因,所以描写是主要的。为现代汉语语音的形成做出阐释,主要靠音理分析,但又离不开描写。

研究近代汉语音韵,要讲究研究方法。就宏观的、指导性的

^① 参蒋冀骋《论近代汉语的上限》(上)(下),《古汉语研究》,1990年4期;1991年2期。

方法而言,要掌握和运用以下几种方法。^①

一、唯物辩证法。唯物论要求我们的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从语言事实出发,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不能在语言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凭借想像和推理,来建立一个语言系统,“六经注我”。辩证法要求我们要用变化的、发展的观点来观察语言现象,而这种变化和发展是建立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基础上的。如现代汉语的“张”等一类字的读音,在中古以及近代初期(宋和元初)都有“i”介音,但声母不卷舌,元代以降,“张”等字的“i”介音逐渐消失,而声母已卷舌,是“i”介音消失引起声母的卷舌,还是声母的卷舌引起“i”介音的消失?很难确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声韵之间的相互影响促使了这一语音演变的完成。所以,研究音韵也要有辩证的观点。

二、普通语言学理论。语言富有系统性,无论是材料的归纳,还是逻辑、音理的演绎,都要注意系统性。这是普通语言学的一个基本观点。语法如此、词汇如此、语音也是如此。如我们认为晚唐五代时期的声母系统中应该有“娘”母,除了语音材料——朱翱反切、颜师古《汉书注》反切、李善《文选注》反切、曹宪《博雅音》反切、汉藏对音材料、梵汉对音材料的证明外,语音的系统性也是一个佐证。详后“晚唐五代音韵”的“声母”部分。

应该指出,在注意系统性的同时,也要注意不成系统的语音演变现象。如入声韵尾的消失,并不是所有的入声韵尾 p、t、k 同时变成了喉塞音,再同时消失的,而是某一类或两类(首先应该是某一类,是 k 尾,还是 t 尾,不能肯定,但绝不是 p 尾)的入声韵尾变成了喉塞音,受已变喉塞音的影响,其他类的入韵尾也

^① 参王力《汉语语音史》,13页。

变为喉塞音。就入声三尾而言,先一类或两类的变化,这是不成系统的;就变化的某一类韵尾而言,它是整个的类的变化,它又是成系统的。语音的演变就是在这种旧系统的打破和新系统的建立中形成的。

就语音而言,掌握普通语言学理论还得注意语音演变规律。语音有生理和物理的特征,某音变成某音,要有人的生理和物理的基础,还要符合语音的演变规律,符合某种语言的语音特点。就是说,讲某音变为某音,要在音理上说得过去,要有音理根据。

三、音位学理论。音位指某语言或方言中有区别词的语音形式作用的最小语音单位。它是语音的区别特征的总和。^① 音位学理论的引进,解决了语音史上的许多问题,尤其是传统音韵学的问题。王力先生说:“全浊声母送气不送气的问题,历来有很多争论。其实全浊声母送气不送气是互换音位,正如现代吴方言一样,全浊声母可以送气,也可以不送气。这样,我们用不送气的音标(b, d, g)表示就行了”。^② 又如《蒙古字韵》的尤韵有“剖、牡、否、谋”和“浮”两组字,前者的八思巴字转写音为 uw, 后者的八思巴字转写为 ow。从音素的角度说,应有不同,但从音位的角度来说,“剖”组字没有“奉”母,而“浮”是奉母字,恰好补上,二者应是同一音位,所以我们把它们都拟作“ou”。具体情况详后。

四、比较语言学理论。比较语言学认为,任何变化都是有条件的。条件相同的,其演变结果必定相同,不会演变出两种不相同的结果。如,古人常用“某读如某”来表示字的读音,一般情况下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古代二字确实同音,那么后世的演变也

① 《中国语言学大辞典》,陈海洋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

② 《汉语语音史》,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5月。

必然相同。一是古代二字只是音近,那么后世的演变则不一定相同,或变成完全不同音,或连音近都谈不上。顾炎武的古音“家”读如“姑”,把“家”“姑”看成完全同音,并据此研究古音,是错误的。又如曾运乾的“喻四归定”,有人把它们看作完全同音,也是可商的。王力先生说:“喻母是三等字,澄母也是三等字,如果喻母归定,澄母也归定(古无舌上音),势必造成两母冲突,以致‘容’、‘重’同音,‘移’、‘驰’同音,‘夷’、‘迟’同音,等等,后来便没有分化的条件了。”^①王先生讲的是上古音韵的问题,但对近代汉语音韵的研究仍有启发作用,我们在讨论近代汉语音韵时要注意分化的条件。

五、汉语音韵研究的具体方法,包括求音类法、求音值法和求音变法。求音类法可分为8种:如反切系联法,反切比较法,音位归纳法,丝联绳引法,离析唐韵法,审音法,音系表解法,统计法。求音值法可分为5种:即历史比较法,内部构拟法,类型拟测法,对音法,方言对照法。求音变法也有二种:即古今音对比法,时空投影法。^②以上五法,第一条是哲学上的方法论,第二、三、四、五条是学科上的方法论,虽然不完整,但也庶几敷用了。此外,还要注意逻辑上的方法论,如归纳法、演绎法和类比法。

以上讲的是方法,下面我们介绍研究近代汉语音韵的材料。

研究近代汉语音韵,材料比较丰富。有韵书韵图,音注反切,诗歌用韵,文献异文,对音材料(梵汉对音、藏汉对音、回鹘语汉语对音、于田语汉语对音、契丹语汉语对音、朝鲜语汉语对音、

^① 《汉语语音史》,22页。

^② 参冯燕《汉语音韵研究方法论》,《汉语音韵学论文集》,14页,首都师大出版社,1997年5月。

蒙汉对音、满汉对音、西夏语汉语对音、琉汉对音)和现代方音。

这些材料在反映实际语音的程度方面,有不同的特点。了解这些特点,对我们正确使用这些材料有较大的帮助。

现代方音是活的语言材料,应该是最能反映语言实际的。但我们的研究对象是晚唐五代至明清之际的音韵,某一方音材料究竟反映哪一时代的语音实际,往往难以论定。如现代黎川方音中“婚”、“魂”、“混”的声母读作“f”,“县”、“玄”的声母也读作“f”,即古音的“晓”、“匣”二母在黎川方音中可以读作“f”。^①这一语音现象反映了哪一时代的语音实际?难以确定。用来证古,还得考证一下这一方言的语音特征是某一时代语音的历史沉淀,否则作用不太大。何况方言古已有之,春秋时期就有齐语、楚语、鲁语的区别,《公羊传》《左传》均有记载。《孟子》对南蛮鴟舌之人的蔑视,《楚辞》对“羌”、“些”、“兮”的记录,皆可证明。颜之推说:“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②戴震说:“音有流变,一系乎地,一系乎时。系乎地者,在古人即非一读,……五方殊语,随声气转变,见于六经者,遽数之不能终其物。六书之谐事假借,《诗》之取韵,各因其声。类中一二字由它类流变而入者用之,非举此两韵字尽通也。其流变所入,各如其方之音,在古人不啻为非正音,不疑其误。盖列国之音即各为正音,不可强而齐之也。”^③是古人已知先秦时期已有方言。我们用方言证古音,所证者无非是秦汉以降以至明清时期的古音,明清去古未远,若用某一方言证明清时期的同一方言,可信程度比较地高一些。若用来证宋元以上的某一方言或某一语音现

① 《黎川方言研究》,颜森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4月。

② 《颜氏家训·音辞》,见《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487页。

③ 戴震《声韵考·卷三·古音》。

象,时代越久远,可靠性越差。所以,方言材料一般情况下也只能作为旁证。这类旁证越多,可信度就越大。

对音指利用非汉语文字拼写或音译不同历史时期的汉语读音或用汉语音译非汉语文献。这些材料对考订不同时期的汉语音韵的音类和音值都很有价值。但由于对音要受对译语言的语音系统的制约,用某字对译某一音素,很多情况下只能取其近似,不可能完完全全的等值。故这类材料也只能作为旁证。如我们今天常把英语的[r],译成汉语的[l],把英语的[kɪ]译成汉语的[tɛi],一般用汉字“基”来表示,我们不能据此认为英语的[r]就是汉语的[l],也不能认为汉字“基”今天仍读[k]声母。

文献异文较能反映当时的语音实际。既可以据以考订声母,也可以据以考订韵系,还可以据以考证声调。但由于形成异文的原因比较复杂,有些是方言的缘故,有些是错别字所致,使用时应当谨慎,至少应先进行一番校订,去伪存真。如敦煌文书的异文,不先进行一番校理,据此研究得到的结论就未必可靠。此外,使用异文时还要注意异文形成的年代和书写者的籍贯。

诗歌用韵能较真实地反映当时的语音实际。尤其是口语化程度较高的诗歌,反映实际语音的程度会更高。即使是格律诗,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口语,如杜甫的诗,也有0.2%不合官韵,^①至于其他作者,则不合官韵的诗会更多。这些不合官韵(出韵)的诗,应是当时实际语音的反映。所以,无论是格律诗,还是口语诗(包括词、曲),它们的用韵都是研究音韵的重要材料。但诗歌用韵只能归纳韵部的大势,无法窥测当时韵母系统的全貌。至于声母,则不能提供任何研究线索。此其所短。

① 参刘钧杰《再说〈杜诗与唐代口语〉》,《中国语文》,1984年第1期。

音注反切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出语音系统,但由于师承、流行韵书的影响,音注反切跟诗歌用韵材料比起来,反映实际语音的程度要差一些。如朱翱反切中,“齐”韵不与“脂微”(《切韵》的“支脂之微”)韵合流,而敦煌变文的用韵中,“齐”韵已入“支微”,与《切韵指掌图》相近。于此可见一斑。可以说,与诗歌用韵相比,在反映韵系方面,音注反切要保守一些;与文献异文相比,非独在反映韵系方面,在反映声母、声调方面,音注反切也要保守一些,即离实际语音远一些。

韵书、韵图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些能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实际语音,如《中原音韵》。有些则继承《切韵》传统,对实际语音无所反映或反映较少,如《广韵》。有些虽则继承《切韵》传统,但继承中有发展,部分糅进了当时的实际语音,如《古今韵会举要》。^① 韵图的情况更加复杂,有表现中古音系的韵图,如《韵镜》、《七音略》,有大框架反映中古音系,但也反映时音的,如《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有基本上反映时音,但所反映的不只一个方音,而是杂取几种方音糅合成的,如《李氏音鉴》。耿振生同志曾对这种情况进行过研究,他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近代汉语书面音系”的“复合性特点”,^② 他说:“所谓复合性,指一部韵书、等韵图中的语音系统不纯粹反映某一个方言的共时语音面貌,其中包含着从不同的‘背景材料’里取来的音类,有的是把时音成分和古音成分糅合在一起,有的是把不同方言的语音特征糅合在一起。……在众多的近代音韵著作中,真正的单纯音系很少,而复合音系占大多数。”所以,在使用这些材料时,还要花一番甄别的工夫,弄清哪些是继承,哪些是发展,哪些是古音,哪些

① 参王力《汉语音韵学》,482页。

② 耿振生《论近代书面音系研究方法》,《古汉语研究》,44页,1993年4月。

是时音,哪些是方音,哪些是共同语音,分清主次,用其精华。

研究近代汉语音韵要注意语音的地域性。华夏幅员广阔,南音北音自古有异。南方方音至今尚有一些方言保存了完整的入声系统、成套的浊声母和 m 韵尾,与北音迥异。因此要区别对待,要注意语音的地域性。不能将北音的材料证南音,也不能用南音的材料证方音,尤其不能从共时的角度来进行南北音互证,纵使从历时的角度来看问题,也只能用作旁证。但方言材料对鉴别书面音系的方言归属,对音值的构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章 晚唐五代音韵

晚唐五代汉语上承中古,下启近现代,是近代汉语的第一时期,即初始期。这一时期的汉语音韵既保留了中古汉语音韵的很多特点,又开始露出了近代汉语音韵的某些特征。

晚唐五代音韵的基本特点是:(1)轻唇四母已从重唇中分出;(2)浊声母开始消变;(3)部分韵部合并;(4)“尤侯”韵的唇音字大部分转入了“鱼模”韵(如“部”、“妇”等);(5)浊上开始变去。

现在从声、韵、调三个方面来论述晚唐五代的音韵概况。

一 声母系统

研究声母系统的材料当首推音注反切和文献中的异文别字。音注反切反映的音系比较完整,异文别字由于受材料的限制,反映的音系在完整性方面要差一些。但音注反切受师承、韵书的影响,反映实际语音方面要保守些,而由于语音原因形成的异文别字则能较真实地反映语音实际。所以二者所反映的音系有一定的差别。

(一) 通语的声母系统

晚唐五代时期的反切较能反映实际语音(应该是当时的“通

语”语音)的当是《说文系传》的朱翱反切。今以朱翱反切为依据来讨论晚唐五代的声母系统。

据王力先生研究,朱翱反切反映的声母共有 35 个,即:

1. 牙音:见、溪、群、疑;
2. 舌头音:端、透、定、泥;
3. 舌上音:知、彻、澄、娘;
4. 重唇音:帮、滂、並、明;
5. 轻唇音:非(敷)、奉、微;
6. 齿头音:精、清、心、邪(从);
7. 舌齿音:庄、初、山;
8. 正齿音:照、穿、审、禅(床神);
9. 喉音:影、晓、匣(喻);
10. 半舌半齿:来、日。^①

但在《汉语语音史》中,王力先生根据朱翱反切定晚唐五代的声母为 36 个,即:

帮 p ^②	滂 p'	並 b	明 m
非(敷) f	奉 v	微 ɱ	
端 t	透 t'	定 d	泥 n
知 ʈ	彻 ʈ'	澄 ɖ	娘 ɳ
精 ts	清 ts'	心 s	从(邪) z
照 tʂ	穿 tʂ'	审 ʂ	床(神禅) ʐ
庄 tʃ	初 tʃ'	山 ʃ	
见 k	溪 k'	群 g	疑 ŋ
影 ʔ	晓 h	匣 ɦ	喻 j 来 l 日 r

① 参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三)“朱翱反切考”。

② 本书所用国际音标皆省去[]号,特殊情况除外。

将喻母独立，故多了一母。

王力说：“在朱翱反切中，匣母与喻三、喻四合流。……匣母与喻三、喻四混合，和现代吴语相符合。这恐怕是方言现象。现在我们依守温字母，把喻三、喻四合并为喻母，匣母独立”（233页）。

我们认为，喻三分立是对的。朱翱反切所显示的匣母与喻三、喻四混合的情况，正如王力先生所说，是一种方言现象。《切韵》音系里面，喻三还未从匣母中分化出来。隋唐之际，喻三仍然与匣母合用，未见分化。陆德明《经典释文》反切可以证明（详参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三册，153页）。但中唐前后的某些音注材料，已开始分化了。颜师古《汉书注》的反切、李贤《后汉书注》的反切，匣母、喻三、喻四分立。喻三不再与匣母合用。^①颜师古家学渊源，李贤以太子之尊，召集众多文人作注，其音切当具有相当程度的权威性，应是当时“通语”音的代表。又张守节《史记正义》的反切涉及匣母与喻三的共84例，^②只有一例是喻三与匣母混切的。但被注音的字是地名，如《秦本纪》：“兵至滑。”《正义》：“为八反。”“滑”在匣母，“为”在喻三。是沿用旧反切，还是别的缘故，不敢肯定。但沿用旧反切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地名读音虽有其特殊性，但“为八”与“户八”的读音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说，是沿用旧反切所致。

就目前所能见到的唐五代西北方音材料来看，喻三与匣母应是分立的。据邵荣芬先生《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与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研究结论：唐五代西北方音是“晓匣代用”、“云以

^① 参黄富成《〈汉书〉颜注反切考》、黄锦君《〈后汉书〉李贤注反切考》，见《语言学新探》，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

^② 参龙异腾《〈史记正义〉反切考》，《贵州大学学报》，1994年1月。